

11.11

龍泉文史資料

第三輯



8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龍泉文史資料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專輯)

第三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浙江省龍泉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

一九八五年九月

篇 前 短 语

今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征集编印了这一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四十八年前，“七·七”芦沟桥头的炮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帷幕。寇深祸亟，大敌当前，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面对着严峻的局势，肩负着抗战的重任。中国共产党洞察到民族存亡之危险，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倡导国共合作，动员和组织全国的民众，前赴后继，力挽狂澜，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和政府官员，也坚持了抗日战争。

在八年抗战期间，省城机关学校纷纷内迁龙泉，山城成了浙西南抗日的大后方。这时，中国共产党派来了张三扬、邵荃麟、葛琴、俞坚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唐巽泽县长合作，团结全县工农商学兵各族各界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救亡队伍，使古老的山城顷刻沸腾，抗日救亡歌声到处嘹亮，民族气节光霁普照大地，人民受到教育，人民受到锻炼，人民也赢得进步。四十多年前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印记在全县人民的心坎中。

本期“抗日救亡”专栏，特刊了当年在龙泉战斗过的革命老前辈舒文同志撰写的《回忆和唐巽泽先生合作的日子》，林千同志的回忆录《投笔从戎，奔赴延安》，还有当年的政

工队员记叙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史实，这些写人记事的文章，都是情真意切之作。

在“人物春秋”专栏里，发表了爱国民主人士唐巽泽先生生前留下的《我在龙泉任职的陈述》以及当年跟随唐巽泽先生在龙泉工作过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和本县各界人士撰写的和唐巽泽先生共事的亲身所历、所见、所闻的史实，内容比较丰富，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文史，是记载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教育后代的资料。世事浮沉，人生百态，各行各业，都有写史料的好题材。史笔的要求首先是史，即把历史事件和人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实写下来，其次才是文，“以文载史”就是史笔特点。我们亟盼全县史学界同仁、社会上各界人士及在龙泉战斗、生活过的老同志多为我们撰写文史稿件，使这一文史读物能对现在和后世的人们起到借鉴作用，为当前四化建设及统一祖国大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目录

抗日救亡

- 回忆和唐巽泽先生合作的日子……………舒文（1）
- 投笔从戎 奔赴延安……………林千（12）
- 龙泉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周文郁等（19）
- 我在龙泉政工队六个月……………李世家（28）
- 抗战初期的龙泉民众教育馆……………赵火蛟（32）
- 龙泉民众剧场……………程春生（36）
- 烽火连天起 抗日激情高
- 抗战初期龙泉抗日宣传见闻……………李川（42）
- 夜战“大刀会”……………杨萤（47）
- 抗战时期的龙泉军警稽查处……………杨文 程春生（53）
- 忆安仁镇的二五减租……………叶诚（57）
- 抗战初期龙泉的妇女自卫队……………孙影（60）

人物春秋

- 我在龙泉任职的陈述……………唐巽泽（63）
- 抗战初期的唐巽泽与龙泉县政……………周吉士（81）
- 我的叔父唐巽泽……………唐之准（94）
- 怀念唐巽泽……………周平英（105）

操守廉洁 生活简朴

- 记唐巽泽先生倡导领“国难薪……”钟裕恪 (113)
唐巽泽先生二三事……………周南等 (116)
缅怀良师唐县长……………陈锦麟 (122)

龙渊旧事

- 抗战流亡在龙泉单位总览……………吴南连 张绍文 (126)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三迁龙泉……………魏纪良等 (131)
浙江省电信管理局在查田……………唐连永 钱耀远 (136)
抗战时期省金融业在龙泉……………王恭敏 (139)
记抗战迁龙的浙江地方银行……………徐之潮 (146)
在龙泉山岙里办报……………林芷茵 (149)
两浙盐务管理局抗战迁龙概况……………徐起佳 (155)
抗日战争年代的安仁镇……………叶 诚 (157)
英军代表团在龙泉简况……………周 南 (161)
记忆中的龙泉盟军招待所……………徐时驷 (163)
吴玉琨伏法记……………杨 莹 (168)
- 诗词集锦：郑晓沧、余绍宋诗抄…………… (175)
- 狂欢之夜 狂欢的山城…………… (179)

回忆和唐巽泽先生合作的日子

舒 文

龙泉县政协同志约我写一篇回忆唐巽泽先生在龙泉和地下党合作共事的文章，我欣然同意。唐巽泽是值得纪念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都曾同我党密切合作。他在建国以后，作为民主建国会的浙江负责人、水产厅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样一位党的老朋友，和我们党的许多忠诚的老同志一样，在十年浩劫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代理人的迫害，终致含冤去世。我一直怀念他，并认为应当写文章纪念他。虽然浙江省早已为他平反昭雪，他于抗战初期在龙泉任县长时的事迹，还是值得写出来，可以作为对他的纪念，也可作龙泉抗战时期的一段重要史料。

同我党合作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十二月杭州沦

陷，蒋介石在浙江的统治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任命比较坚决抗战的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以图挽回危局。当时，我党积极推动黄绍竑合作抗日，派遣许多同志带领革命青年到浙江工作，帮助他制订战时施政纲领，成立抗日自卫武装，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改组浙南几个县实施民主政治。唐巽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被黄绍竑任命为龙泉县长的。同时改组的有龙泉、遂昌、云和三个县。三县都有一批我党同志和进步青年去工作。到龙泉的是浙江流动剧团的同志，这是唐巽泽通过他的老朋友、和我党同志有关系的徐由整的介绍，约请我们去的。到龙泉的我党同志，大都在宣传、教育、战时动员、政工等部门工作。张三扬（现名张信达）任县政训室主任，邵荃麟任教育科长，葛琴任编审室主任，我任民教馆长，黄灿任民众剧场主任，俞坚、杜大公任政治工作队正副队长，阮秀平任八都区，长晏卓任小梅区长。另又根据我地下党的建议，在四个区设民教分馆，政工队在四个区设区队，自卫队各中队设政治指导员。各区民教分馆主任、政工队区队长、自卫中队政治指导员，几乎全部是我党同志，如丁浩就是八都分馆主任。此外，唐巽泽自己还带去一批原来跟他搞合作工作的人员和老同学等。他们分别掌握秘书、民政、财政、兵役等科和合作事业指导室以及

部分区署的工作。

当时，我们地下党组织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抗战到底方针，积极推行黄绍竑公布的浙江战时施政纲领。唐巽泽对我们的工作一般都是支持的，如出版《龙泉快报》、《大家看》（期刊），编辑抗日课本，办民校、歌咏队、出墙报，举办抗日画展（当时县政府院子里就有王朝闻画的一幅“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大壁画），经常举行抗日戏剧演出，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推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向富户征收抗日报费；实行公平抽签征兵，优待军属；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在广泛发动群众基础上，在全县各乡普遍建立农民救国会，改选了一部分乡保长，推行民主政治，又组织各种青年、妇女抗日团体。还特别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一个妇女分队，由杜毅贞担任分队长。政工队员和各区民教馆同志就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核心，也成为发展和建立我党基层组织的骨干。唐巽泽常常亲自参加一些群众集会，发表讲演。他的太太卢景熹是县政府的监印，也参加妇救会的活动。他自己直接领导的合作事业，对于帮助群众组织生产，促进土特产供销，解决群众生活困难起了积极作用。政工队员也参与合作社工作。

龙泉的进步、抗日工作蓬勃开展，引起国民党中反共顽

固派的极大恐惧，他们散布谣言，说龙泉已成“苏区”，张三扬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要发扬三大政策（指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内反共顽固派不承认的），指名攻击我党同志。张三扬不久去西南大后方。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提出要撤换邵荃麟、徐由整二人，由黄绍竑转告唐巽泽。当时我党组织已有逐渐分散撤离在龙泉太红的同志到别处开辟工作的计划，决定邵、徐两人撤离。邵到金华任浙江省委文委书记；徐去浙西一个游击部队工作，不久牺牲。接着，国民党顽固派主持的浙江省教育厅下令将我的龙泉民教馆长职务撤除。那时，原由张三扬任主任的政训室已取消，改设政工指导室，我党组织决定并向唐建议由我担任县政府政工指导室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兼任），唐接受了。我们同志除由组织主动调出的以外，都仍坚持龙泉工作。

同反动派的几次斗争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最终达到赶走我党在龙同志的目的，决定首先赶走县长唐巽泽，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那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实属少见。这里写出两个事件，用以帮助今天的同志了解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一是袁飞五事件。旧政府的内收发，照例由县长亲信担

任，龙泉县政府内收发袁飞五，是唐巽泽的同乡和远亲，单身在县，工作一向小心谨慎，受到唐的信任。到一九三九年，唐却经常受到省政府和专署指责，说是龙泉县政府许多税收表册及公文，久久未见上报或呈复。开初并未引起注意。以后，一个自卫队军官到职，按规定应于三天内上报，但上级连催数次未有结果，要追查县长责任，这才大为骇异。唐责成主任秘书在收发室亲自追查，竟发现数百件公文报表被埋在袁飞五收发室兼卧室的地板之下。随将袁逮捕审讯。事发之后，唐巽泽找到我们，说他自己带来的人靠不住，还是我们的同志可靠，要我们帮他查清这个案件。于是，这个案件就由俞坚负责审查，终于弄清了真相。原来，因唐巽泽主政实行经济合理负担，要富户多出钱；又实行公平抽签，使富户子弟也得当兵，因而得罪了当地豪绅。于是，国民党内顽固派就和反动豪绅合作制造赶唐阴谋。由豪绅蔡起澜（儿子逃避兵役，受过唐的处理）出面拉拢袁飞五，经常请他到蔡家吃酒，又让孀居的女儿出来勾引，将袁捉住，逼写字据，说是欠款数百元，只要袁将县政府来往的公函压下销毁，唐被撤职，欠款即可免交。破案后，袁受到法办。但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仍就此事大做文章，在它主持的刊物上攻击龙泉县政府是“官僚主义的典型”、“非改组不可”，云

云。

二是吴玉琨事件。吴玉琨原是唐巽泽的卫兵，后到县自卫队当班长、分队长（排长）。此人喜欢吃喝嫖赌，当地豪绅势力就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进而打击唐巽泽。他们先是请酒，进而赌博，吴输掉了积蓄，又输掉饷银，就盗卖弹药，最后诱他带队上山为匪。浙江国民党反动派就此事大肆造谣，说唐巽泽纵使部下携械上山投共（当时住龙乡一带有我党秘密武装游击队），想逼唐下台。唐巽泽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山里同志（即秘密武装）配合，帮助他追回人和枪。我们当即派张延林向我地下党县委书记宣恩金同志报告，同时由杜大公带领政工队同志参加县政府追捕部队，向吴玉琨等人展开政治喊话。结果，吴玉琨手下的士兵纷纷携械来归，吴玉琨本人束手就擒，后被国民党政府枪决。吴玉琨上山为匪的前因后果，本极明显，而且在当时我党和唐巽泽领导的龙泉县政府进行合作抗日的形势下，他的行为，实际是破坏了抗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竟颠倒黑白，硬说吴玉琨是从国民党部队中“起义”上山参加“革命”的，唐巽泽是镇压革命的“罪人”。据说，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今天把这件事讲清楚，还是很有必要的。

国民党龙泉县党部杨登池等一些反共顽固派，经常派特务在汽车站检查我党秘密来往人员。一次，被查出一封在外地受训的政工队员夏同仁致孙影的信，信后写有致“布礼”二字（即致布尔塞维克敬礼），杨登池持此信向唐巽泽质问，指证夏、孙二人是共产党员。我们被迫只好将夏、孙二人撤出龙泉。当时，我党组织正考虑如何掩护我秘密来往人员并回击顽固派的挑衅。在前述袁飞五、吴玉琨等事件后，龙泉县政府决定组织军警联合稽查处，唐巽泽要求我们同志参加，帮助他同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作斗争。我们派人进去了。同时，唐巽泽又派侄子唐之准参加军警联合稽查处工作。所以，当时的斗争很复杂。我们利用稽查处的名义，曾经到邮政局查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致龙泉县党部的反共密件，也曾和唐巽泽共商利用查赌抓过反动豪绅，更多的是掩护我党秘密交通、传达文件。我们的人，常常在汽车站和杨登池派去的人互相对立监视。

对我党同志的态度

唐巽泽在龙泉期间，对我党同志是友好和合作的，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赞同的。特别当国民党内反共顽固派压得他很紧时，他常常表示要更加依靠我党同志。当

然，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也流露过希望我们撤走一些太红的同志，对我们的一些行动提出他认为太过份了的批评。我们也对他进行过一些必要的帮助，主要解释党的方针政策，以坚定他同我党同志合作抗日的决心。

我们多数同志都没有正式向他暴露过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在多次场合，一些同志也以党员身份同他接触过。他大约在早年接受过党的革命影响，所以这些接触并未引起意外或使他觉得意外。有些接触则是他主动要求的。

一九三八年夏，我们到龙泉不久，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派吴毓同志来巡视工作，当时我们组织还叫“特支”，直属临时省委领导。有一天，“特支”由书记张三扬主持，在县政府隔壁县中心小学内开会，“特支”委员邵荃麟、葛琴、俞坚和我都在，吴毓也在，唐巽泽大约有些察觉，突然闯了进来，大家都愣了一下，三扬正穿着背心，连忙穿上衬衫。唐说：“不要客气嘛！”三扬乘机解释并解嘲说：“无产阶级看到县长，还是要讲点礼貌的。”在向他介绍了吴毓后，唐走了。会后，我们商量由吴毓同志以上级党组织代表身份同他谈话，并向他介绍了张三扬、邵荃麟二人的党员身份。

一九三九年，处属特委书记张麒麟同志经过龙泉车站，被警察所警察作为可疑人员扣留，带到警察所，警佐周诚

向唐报告，经我们的同志向唐说明，唐问张麒麟谈了话，又请吃饭，然后悄悄放走。是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反共，徐山整、张三扬、邵荃麟、葛琴等已于一九三八年秋冬先后离开龙泉，一九三九年夏俞坚因为在龙泉太红，也转到绍兴去工作。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内部会议上宣布我和杜大公是龙泉共产党。省主席黄绍竑在顽固派反共压力下，写信给唐巽泽，提出五个人的名字——邵荃麟、葛琴、俞坚、黄灿和我，说如要继续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应参加国民党。这五人中，当时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龙泉。唐约我谈话，将黄信给我看，他是希望我参加国民党而留在龙泉县政府工作。我经向组织请示后表示，不参加国民党，但可以考虑参加三青团（当时浙江的党组织有过这种指示）。不过，后来三青团方面也不敢要我参加。我仍留在龙泉县政府工作。组织上给我的指示是，尽量坚持龙泉的公开工作，如有危险，可向山里撤，或向新四军撤。

一九四〇年春，形势继续恶化，根据组织指示，将一些面目太红的同志撤离龙泉，先后撤走的有丁浩、屈品生、骆静美等，都是到皖南新四军去的，均由我向唐说明，是由于国民党县党部攻击他们，为了不使唐为难，他们将到别处去工作，但未说明去处。唐有所领会，表示同意他们离开，但

说：“你们同志紧急时有地方去，我怎么办？”我们向他作了必要的解释和安慰。

一九四〇年开始，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决定要将各县改工队改组，排除其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五月，调各县政工指导室副主任和政工队长到碧湖集训，我和杜大公去了。六月，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下令逮捕我和杜大公同志。我们因得到党内通知，秘密离开碧湖国民党省政府训练团，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自此结束在龙泉的工作。我爱人苏星于八月由组织介绍到新四军。此后在龙泉作公开工作的同志纷纷离开，有的同志（如杜毅贞）则转入山区坚持斗争。据后来了解，唐巽泽也于一九四〇年十月调离龙泉县长职务，回到省政府建设厅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参加接管上海市教育局，得知唐巽泽没有长期在国民党政府中作官，是在复旦大学任教，他来看过我，畅叙别情。他和我们地下党同志常有过往，始终保持民主爱国、支持进步的立场。不久，浙江省领导请他回浙江工作，担任民主建国会浙江省负责人、水产厅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听说他是主动接受党的领导，工作很积极。其间，在上海和浙江，我们曾多次见面叙谈。十年浩劫开始，他在浙江受迫害，我在上海受迫害。我挺过来了，而

且今天还能对党工作。而长期同我党合作的 他，却于“文革”初期不堪虐待，含冤去世。唐巽泽到龙泉任县长时，不过二十八岁，在龙泉工作近三年期间，坚持民主、坚持进步、坚持抗战，个人生活艰苦朴素，经常翻山越岭，深入民间，发动群众抗日，主持合作事业，发展生产。唐巽泽先生在龙泉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切的怀念，也在当时在龙泉工作过的我党同志的心中，留下深切的怀念。

（本文作者，浙江青田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龙泉县委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宣教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处长、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市科委主任、市高教局局长，一九八五年七月起，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